

先總統 蔣公社會變遷思想之研究

方鵬程

前言

先總統 蔣公不僅是近代中國的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一生以救國救民為職志，承繼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凡五十餘年，也是百世難得一見的思想家，除了對 國父革命學問有深入的研究與闡發，更能承先啓後，開拓恢宏。在諸方面思想的建樹中， 蔣公對社會思想的用力極深，如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國經濟學說」、「中國之命運」、「反共抗俄基本論」……等文，均可看出其對中國社會的關注與仁民愛物的胸懷。

「社會變遷」雖是一個新有的名詞，普遍為西方學者所使用，也漸為國內學者所接受。本文嘗試整理先總統 蔣公遺訓中有關社會變遷思想的言論，並了解其精義，以使我國在社會建設上有一明確的指向。

壹、蔣公社會變遷思想中的基本觀念

先總統 蔣公的社會變遷思想中，有下列五個主要的概念：

一、行的宇宙 「我們中國的哲學家，認為天體運行，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理。我更認為：『古今往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宇宙根本是由它自身的行而創造出來的。如果沒有天體的運行，就根本不會有宇宙。科學告訴我們地球之由氣體而液體，而固體，亦是由於他不斷的運行而起的變化。地球成了固體後，還是在不斷的運行之中，於是由物質而物種而人類，再由於人類不斷的行，於是更創造了一個新的宇宙——社會。……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亦無一不是由行而創造出來，離開了行就不會有宇宙。」①這點說明了行是社會變遷的原理所在，沒有行即沒有一切，也沒有變遷了。

二、有意義的宇宙 「宇宙究是個別事物雜然羅列呢？還是有基本體整然不亂呢？宇宙如有一整然不亂的本體，那麼宇宙的本體，當然是有秩序、有軌範，固而復始的運行著。換言之，這宇宙本體，決不是僵而不行、死沉沉的龐然大物，而乃是有生命、有活力、有意義、生生不息、日新又新的本論。」②，由於 蔣公肯定宇宙是有意義的，它的行是有秩序的，所以人類要效法天體運行，他要我們體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此意。蔣公說：「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的，有秩序，有秩序，有系統，而且有『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③

三、歷史的動力一元論 「社會進化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進化又以民生為重心。總理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那是以什麼為重心呢？民生就是一切社會活動中的原動力。』

然而民生無論在民生主義、民生史觀、或民生問題中，都有其一貫之理，就是民生不單是物質，民生也不單是精神，民生是精神與物質配合統一而得到生存的。總理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當知 總理會根據蠅蠅為求生存而發明蒙藥之術，以採取螟蛉為糧之事實，去說明『精神和物質都是求生存需要的產物』，和說明『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生，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故人類求生存是動力，而精神與物質只是條件。」④，由上引，我們因此可以肯定歷史的動力是一元的。

四、歷史的條件多元論 也由上引，我們亦可知，蔣公是主張歷史的條件是多元的。關於人類求生存的條件，國父亦曾有明白的指示。國父說：「人類要能生存，就需要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是政治，養是經濟，都是歷史的條件。

任卓宣先生也認為人類為求生存，從根本上說，有三個必要的條件：「第一為環境。人類求生存於一定的環境之中。此環境，首先是自然。所謂自然包括甚多，土地是其重要的一種。誰不知道土地為『生產之要素』嗎？食衣住行等消費品，皆從土地來，皆從自然來。第二為思想。人類在自然中找尋消費品，必須認識自然才能成功。認識自然是經過思維了的，其所得為思想，普通叫做知識，亦即科學，自然科學。這是與人類求生存以俱來的。否則人類求生存為不可能。第三為方法。人類認識自然後便要改變自然，使其成為消費品，改變需要方法，是即技術、勞動和組織。技術是運用物力，勞動是運用人力，組織是運用群力，因改變自然為社會的行為之故。以上所說的環境、思想、方法三種條件，詳言之即自然、科學、技術、勞動、組織等，是人類求生存所必需。……那三種條件，環境是自然，就是物質。思想是科學，就是精神。方法呢？技術是工具，有物質，也有精神。很明白，工具是自然之施以人工者。自然為物質，人工不單有體力在內，也有智力在內。一句話，工具是人依照思

想改變自然的產物。勞動即人工，統指勞心勞力者言。就是勞動者底勞動，亦不單屬體力活動，而有其智力活動底成份。所以勞動有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性質。組織是依照思想而有的人間關係。人是物質，是有思想的物質。而思想則是精神。所以組織有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成份。⑤

人是社會的動物，又是歷史的動物 蔣公承繼 國父人類三系與歷史三期的理論，來論定人的地位，他說：「民生史觀以人類求生存，為社會和歷史的重心。亦就是人類求生存，為歷史的動力。保養是歷史的條件，然而人類求生存的行程，從橫面看，是社會，從縱面看，是歷史。人是社會的動物，又是歷史的動物。總理從橫面上分社會為三種人：一是先知先覺，二是後知後覺，三是不知不覺。就個體說，有知有不知，就群體說，社會的進化與歷史的發展，都是這三種人共同的事業和成績。其次，總理再從縱面上，分歷史為三個階段，不知而行，是人類受自然支配的時期；行而後知，是過渡時期；知而後行，是文明人有意識有標的時期。但是人類的行，不是孤行，也不是冥行，人類的行，乃是群體的活動，和意識的活動，亦就是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以及群衆的生命而活動的行。」⑥

貳、中國社會的特徵

這裏所要探討的中國社會的特徵，是依據 蔣公遺訓的昭示，與時賢的論述⑦，加以整理而成，由於中國自秦朝以來即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社會，五千年來的歷史傳習，至今仍普遍的影響著中國廣大的群衆。

「是一個具有大陸習性的社會 先總統 蔣公說：「我們是一個歷史久遠的大陸國家。因此我們的民族，也就有其特有的大陸習性。大家知道，我們從商周以達於漢唐，都有過恢宏的規模，和完美的制度，但是它就無法避免養成一種大陸國家特有的民族習性，那實在也是由於大陸的氣候、地理，以及各種生活、傳統累積而來的。所謂大陸的民族習性，最顯著的，就是安土重遷和安居樂業的心理。由於這種心理的影響，大多數都缺乏積極、進取、協同、合作與主動的精神，因之亦沒有研究、發展、創造和負責的習慣。幾千百年的積習所遺傳下來的，就只有遲鈍、粗重、散漫、消極和自私的習性。到了今天，對於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幾乎都逐漸消失，當然更談不上革命精神了。因之歷史政治，雖亦常能保持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統一局面，但那總是幅員上的統一，而不是意志上的統一，更不是國力上的集中，一切都形成了形式上的墨守成規，却忽略了精神上的團結一致。所以見之於人心風俗的，也就是淳厚樸實有餘，而進取和發展的行動沒有。」⑧，從這一段話中，我們知道，中國是一

個大陸習性的社會，有其優點，如淳厚樸實，也有其缺點，如缺乏進取與開創之恢宏，造成的因素很多，如歷史久遠、氣候、地理、生活、心理、習性與傳統等，其中有不可變移的，如歷史、氣候、地理，也有可變移的，如生活、心理、習性與傳統。

三中國社會具有濃厚的倫理性。「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爲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衆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會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疏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⑨，這些民族的倫理當然是中國社會好的一面。蔣公極力保留它，「我以為這民主與科學，自然是我們建國所必須的口號，更是我們革命所必須的口號，但是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來做民主與科學的基礎，那來這兩個口號，不僅不能救國，而且徒增國家的危機。」⑩，但是很可惜的是，這些民族倫理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都爲之瓦解了。

三中國的社會是農業社會。「我們中國的經濟重心，在歷史上本有三期的演變。秦漢時期，經濟最發達的處所，是在黃河流域。自三國以至於隋唐，黃河流域的經濟，稍形衰落，長江流域的經濟發達起來。由宋到清，國家逐漸仰給於東南的財賦。元朝亡後，歐亞兩洲陸路的交通中斷，中國的西部都市日就衰微。西葡荷英諸國海上通商的活動，直達我沿海的各區，東南的都市相繼趨於繁盛。所以千年來中國大一統的規模，大體上可以說是「以東南之富，養西北之兵」。然而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⑪

中國向以農立國，五千年來的積習，也產生了不少農業社會的病態，蔣公共列舉了十項：第一是輕忽時間，第二是不重數字，第三是不知奮勉向上，第四是消極頹唐，第五是不分本末，不求重點，第六是消耗浪費，第七是反科學，第八是反組織，第九是反紀律，第十是因循苟且⑫，這些都是農業社會中顯著的缺點，也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而不進化的原因。

農業社會雖有這麼多的缺點，但也有其優點，值得我們保持與發揚。蔣公也多有論到，此處暫且不引。

以上僅以俯瞰式的方式，大略了解一下蔣公分析中國社會的特徵，這些特徵有論及五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優點，也指出了其缺點之所在。並且這些特徵隨著歷史的演進由微而顯，由略而微。或許，這個社會如果沒有外力的衝擊，仍能維持或持續其

封閉式的穩定，但是，自從西元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起，古老的中國由於不斷的外力衝擊、一連串的戰敗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漸漸地暴露了她的缺點，她的優點也漸為人們所存疑，甚至揚棄，終於她的缺點總和超過了她的優點所能負荷，而開啓了她的「悲劇世紀」。

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中，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只是限於軍事的層面，但繼軍事的一連串失敗而所產生的變化，則擴及到經濟、政治、社會、心理各個層面。

據傅啓學先生研究百餘年來中國國際地位的演變指出⑬：

- (一) 鴉片戰爭前，中國係一等強國。
- (二) 一八六〇年後，變為一等弱國。
- (三) 一八九五年後，淪為三等弱國。
- (四) 一九〇一年後，由三等弱國，更淪為次殖民地。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至少有二千年的穩定，並且一直沉迷著「天朝的榮光」。西方學者艾森斯達(S. N. Eisenstadt)也認為中國在過去從沒有發生過全部的、原級社會的及永久性的變遷，而只有過適應性的、次級社會的及循環式的變遷⑭，的確，古老的中國真的禁不起如此全面的衝擊，可是，當她無法避免時，她已一再淪弱，成為列強的次殖民地了。

叁、近代中國社會的本質——是次殖民地社會不是封建社會

「次殖民地」社會在近代中國出現，這是一件事實，中國的社會與人民深受其害；可以這麼說，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願意看見自己的國家任人宰割，更不願意身處其中，飽嚙悲慘，同樣地，誰又願意一天到晚將「次殖民地」這個名詞與一個可愛的國家同擺並列呢？

國父說明中國受到列強的欺壓，受到帝國主義自然力、政治力與經濟力的侵略，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⑮，是在一種無奈的情境下，為了喚起民衆知道自己國家處境的危險，為了要使四萬萬的中國人能團結在一起，為國事奮鬥，才以這一個名稱加在近代的中國社會。

先總統 蔣公對於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個論點，亦有說明。他說：「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與殖民地的分別之點，就

是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直接負責統治，所以對當地人民的生活與治安等，有時還要擔負其保護之責。而帝國主義在次殖民地的統治，是只對當地傀儡政府予取予求，而任何帝國主義，皆可與其享受同等權利。而他亦不負任何責任，……這種次殖民地的地位，比殖民地更爲低劣，而其被侵略的痛苦，亦比任何殖民地更爲悲慘。」^⑬

由上可知，誰都不願意是次殖民地社會的人民，可是事實不容否定，我們曾做各國的奴隸。

可是帝俄一直抱持著侵華、亡華的陰謀，欲亡我中華而後快。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寧即武斷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自此之後列寧史達林所御用的共產國際一直謬執此說，曲解中國的次殖民地社會也是其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並唆使朱毛匪幫將中國革命納入所謂「世界革命」的範圍，藉以破壞我們的民族主義。

所以 蔣公在民國四十一年，特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本質，他說：「馬克斯主義所說的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二千年以前，自從土地自由買賣之後，是已不存在了。所以 總理從來沒有說中國社會是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只說中國封建制度，在二千年前就破壞了，只說過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淪爲次殖民地。」^⑭

他更進一步說明次殖民地社會的根本問題有三^⑮：

一 異族侵略中國民族喪失了自信心 滿清入關以後，二百年來用殘殺和麻醉的手段，來消滅我們的民族思想。近百年間，中國又受了不平等條約束縛，由盲目的排外，一變而爲盲心的媚外。本黨自 總理倡導中國國民革命以來，已六十年，推翻滿清帝制，肅清割據軍閥，打倒日本軍閥的侵略，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本已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消雪了次殖民地的耻辱，而獲得了國家獨立自由地位。乃蘇俄帝國主義者竟役使其第五縱隊朱毛匪徒施用其武力的叛亂和文化的麻醉，侵略我國家領土，毀滅我民族倫理，破壞我歷史文化，更使我們大陸淪陷爲次殖民地中之殖民地。

二 社會生產落後民生凋敝日甚 再從經濟方面來說，我們中國的衰弱，以生產力的落後爲其主要原因，一百年來，列強資本主義發達以後，我們的農業與手工業漸見衰落，而且地權不能平均，農民終歲勤勞所得，不足一飽，因之農業的生產不能發達而還要從外國進口麵粉和糧米，來供民食，如果與外國機器工業競爭，就要發展中國工業，但又缺乏資本。所以我們的民生問題就到了民窮財盡的時候。而人民所受的痛苦就是貧病交迫，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因之我們今後要解除人民的痛苦，提高人民的生活，來解決民生問題，就只有發達機器工業與解決土地問題。

三 人民沒有基本權利喪失了一切自由 我們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取得國家獨立自由的地位，解決民生問題，用什麼力量呢？我們的力量就是民權。 總理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詳細說明人類爲求生存而奮鬥的第四個時期：就是人民對專制暴君相

爭，所以叫做民權時代。「權」是什麼？總理說：「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所以民權就是對外求得民族生存，對內解決民生問題的一種力量。爲什麼人民要喪失一切自由權呢？就是從前中國人民是一片散沙，沒有基本組織，更沒有地方自治，所以不能發生真正的民權。現在共匪控制之下，人民更是喪失了一切自由權利，當然更無民權可言了。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社會，她有兩個根本的問題，包括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絕對不是列寧、史達林口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陶希聖先生曾言：「在今日，與其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不如對中國社會加以深刻的觀察。要解決問題，須先知問題之所在。中國社會結構是中國目前要解決的一切問題的根源。不認識中國社會構造便不知中國的問題。不知道中國問題，便無從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⑩，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念，國父與先總統蔣公即曾先後洞察國際情勢、分析中國社會狀況，並爲中國找尋未來的路。這不是帝俄或朱毛奸匪爲道其野心，隨意曲解中國社會性質所能否定的。

肆、中國社會變遷的動向

先總統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曾多次提到「社會變遷」，雖然他不曾替這個名詞下過定義，但是他分析問題時，都是時常注意到社會變遷的。

從上一節中，蔣公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本質，其中論述次殖民地的三個根本問題，我們稍加體會，即可得知，造成近代中國的巨變，絕不是單一的原因所造成的，蔣公是採用多元原因的。

一、中國社會變遷的原因

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原因主要有三，茲根據蔣公論述，爰陳如下：

(一) 清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衰落及其對內政策根本的錯誤：「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爲造因。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全爲中國國恥的紀錄。而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⑪

(二) 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訂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具體的結果就是訂立不平等條約。蔣公分析了由鴉片

戰爭到辛亥革命之間，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不平等條約的損失與國民的反應^②，這種飽受各國的摧殘，就是中國求變的一個根源。

(三)受工業革命的激盪 「工業革命要把農業社會變做工業社會。在這一過程中，舊社會組織不能適應這一大轉變，便發生社會問題，引起社會革命，……我們中國近三十年的趨勢，最主要的就是農業已趨凋敝，工業未能順利發達，舊社會組織瓦解，新社會組織還沒有形成。」^②，工業革命也是對中國社會變遷的一股很大的刺激力量。

這三個主要原因有的因 國父與 蔣公相繼領導國民革命而已經得到解決，也有的因時勢所趨，至今仍是尚待克服的。這裏有一點要加以闡明的，即中國近百年來的國民革命之所以能百折不撓，屢奮屢起，完全是由於求生存這個動力的緣故。

雖然造成中國巨大變遷的原因，來自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但是 蔣公認為應從建立自由安全的社會著手，做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他說：「我們在這反共抗俄戰爭中，要恢復中國國家為獨立自由的民主國。必須有計劃、有步驟，重建中國社會為自由安全的社會，來做這獨立民主的國家的基礎。」^③

二、自由安全社會建設的原則

(一)盡人力有計劃的改革社會 蔣公認為我們是要盡人力有計劃的改革社會為自由安全的社會，而不能放任社會的自然發展。他說：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中國既已解決了不平等條約，又復推翻了俄帝的奴役和奸匪的控制，我們的工業必須順利發達，農業也漸能走向機械化的道路。但是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們還是放任社會的自然發展，還是要計劃社會的改革呢？我們今日要解答這一問題，仍須遵守 總理的遺教。總理在民國元年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其批評』，其中說道：『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為，社會主義實為之關鍵。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合，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混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之缺憾也。』」

孫文學說也這樣的說：

「何謂革命之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隨社會趨勢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爲之，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

我們從這兩段話，就可看出 總理對於社會組織的演變，不取放任主義，而主張盡人類的力量來挽救自然演變的缺憾。」

②4

(一)向工業社會邁進 在前面我們討論中國社會的特徵中，已經有討論到農業社會的十項缺點，這些農業社會的病態，並不足以爲整個農業社會的詬病，農業社會還是有他很多的優點，但是 蔣公所指陳的病症，是急於要改正過來的，那要如何改正呢？他認爲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

「我講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也並不是工業社會的產物都是好的，也不能說工業社會裏，完全沒有這些病態，而且工業社會裏更有他很多的毛病和弊害，尤其是他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更爲吾人所反對，需知我今日所指的工業社會，與其說是專指單純的工業而言，無寧說是指現代科學化的精神而言，今日因爲便於講解起見，聊以工業社會名詞代之。總之，我講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就是現代科學化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的用意，只是要以其所長，補其所短，舉其所直，矯其所偏而已，這一點是不能不附帶告訴大家的。」

所謂農業社會病症的針砭是什麼呢？簡單地說，那就是要一反農業社會一般腐舊的習性，這要反過來的習性是什麼？乃是

- (一)要重視時間
- (二)要重視數字
- (三)要競賽向上
- (四)要徹底務實
- (五)要有本末先後
- (六)要有重點中心
- (七)要有創造發明
- (八)要戒除浪費
- (九)要負責服務
- (十)要根據科學
- (十一)要注重組織
- (十二)要重視紀律。

如要問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習性如何區別？我們可以簡直的說，這以上十二種習性，就都是科學化的工業社會所產生和養成的，而農業社會則完全相反了，所以農業社會總是落後，不如工業社會的進步，其原因亦就在此。

除此之外，同時對農業社會的毛病，還要有積極醫治的藥石，那就是更要有奮鬥性、冒險性、和積極性。」^{②5}

三、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指標

蔣公認爲，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自然是以爭取反攻復國勝利爲我們共同目標，只是在這同時，我們還有一個終極的目標，那就是要在復國的歷程中，進行建國的工作——使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畢其功於一役。

而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蔣公認為，必須經由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社會和現代化生活的建設，才能確實植基，茲引述如下：②

(一)現代化政治的潮流和我們現代化政治的前提，乃為民主與自由——但是我們必須防止民主的偏差，與自由的誤用，必須主張貫徹有組織的民主，有紀律的自由。反攻復國是「與民更始」從新建設的開頭，大家必須痛切拔除官僚鄉愿的病根，並必須有經營久遠規模的抱負，更必須有從頭做起，建立現代化政治的責任和知識。

(二)現代化經濟的目的與我們現代化經濟的前提，乃在均富與安和——避免資本制度財富不均，和消滅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流弊，乃為民生主義經濟思想，所特有的功能和屬性。而實業計劃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又為實現此一功能和屬性的正確途徑。

(三)現代社會的意義和我們現代化生活的前提——乃在矯正農業社會散漫落後的習性，和工業社會劇烈競爭的冷酷。我們不要以競爭為基礎，而要以互助、互信、互愛的合作為基礎，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以社會教育、社會福利、社會服務，以求社會之自由樂利與生活之健全發展。

(四)今後教育的綱要，首在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倫理教育，以明禮義、重廉恥，消滅一切染有共產幅射毒素的文化，徹底打破共產主義的形態意識，防制所有鬥爭、報復、仇恨、欺詐、卑鄙、冷酷的觀念和行爲。加強青少年的再教育，使由一個污辱、洗腦、奴役的教育，轉為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學術自由的教育。

伍、結論

綜合以上各節所述，先總統蔣公社會變遷的思想中，行是社會變遷的原理，沒有行即沒有一切，他認為宇宙是有意義的，歷史進化的動力是人類求生存，求生存又以民生為中心，但人類求生存的條件是多元的，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又是歷史的動物。

蔣公也探究這個五千年穩定的社會，認為她是一個具有大陸習性、倫理性、農業性的社會，但到了一八四二年之後，她漸淪入次殖民地社會。

同時蔣公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原因，決定以建設自由安全的社會，做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並且在國民革命的

第三期任務中，除了要完成反共復國的任務外，更要建設一個含有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社會和現代化生活的新中國。

蔣公探討中國社會變遷的動向，完全是冷靜觀察，依據事實，洞悉問題之所在，然後指出解決之法，其可貴之處在此。

羅素（Bertrand Russel）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曾說：「由過去的歷史可證明，不同文化的交流經常是人類進展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希臘文化由學習埃及而來，羅馬文化則由希臘而來，阿拉伯文化又從羅馬帝國而來，中古歐洲繼阿拉伯而來，文藝復興的歐洲文化則是繼承拜占庭的餘緒而來。這些事件中學生經常比老師更優秀，以中國的情形，我們若視中國為學生或許歷史又將重演。」^②，羅素論世界文化的興替，把中國比喻為歐美文化的學生，或許並不完全對，但是每一位中國人都歡喜看到中國再重新振起。

藉著先總統 蔣公對中國社會變遷的分析，我們向建設新中國邁進！

注釋

- ① 先總統 蔣公，「反共抗俄基本論」，「蔣總統言論選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十七年十月二版），反共復國的理論與實踐類，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頁。
- ② 同注①，第五十七頁。
- ③ 先總統 蔣公，「行的道理」，同注①，哲學與科學類，第一一〇頁。
- ④ 同注①，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
- ⑤ 任卓宣，「三民主義新解」（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六十六年四月五版），第十七至十八頁。
- ⑥ 同注①，第六十六頁至六十七頁。
- ⑦ 方青儒先生「憲政思潮」季刊第三十二期，葉祖灝先生在「師大三民主義學報」第五期，彭宗澤先生在「先總統 蔣公社會思想之研究」一書中，均有論及。
- ⑧ 先總統 蔣公，「重建本黨的根本問題」，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五日對中國國民黨七屆二次中央委員會講。
- ⑨ 先總統 蔣公，「中國之命運」（台北，正中書局，民六十五年二月重排十版），第六十一頁。

- ⑩ 先總統 蔣公，「整理文化遺產與改進民族習性」，同注①，教育與文化類，第二五六頁。
- ⑪ 同注⑨，第五十八頁。
- ⑫ 同注⑩，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 ⑬ 傅啓學，「中山思想本義」（台北，國父遺教會，民六十八年三月再版），第八十一至八十六頁。
- ⑭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 (N. Y. Free press, 1963.) p. 323.
- ⑮ 國父，「民族主義」第二講。「國父全集」（台北，中央黨史會，民六十二年六月），第十六至十七頁。
- ⑯ 同注①，第四十八頁。
- ⑰ 同注②，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頁。
- ⑱ 同注①，第四十八至五十頁。
- ⑲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六十八年四月台四版），第一頁。
- ⑳ 同注⑨，第十三頁。
- ㉑ 同注⑨，第十九至三十八頁。
- ㉒ 先總統 蔣公，「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國父全集」（台北，中央黨史會，民六十二年二月），第二二五頁。
- ㉓ 同注②，第二二四頁。
- ㉔ 同注②，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 ㉕ 同注②，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頁。
- ㉖ 先總統 蔣公，「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同注①，第一七九至一八二頁。
- ㉗ 羅素著，宋謂平譯，「中國問題」（台北，有志出版公司，民六十二年三月），第一六七頁。